

张元济和王云五的“转型意识”

熊月之

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,不刻意偏重西、新、今,不极端菲薄中、旧、古,努力模糊古今、中西、新旧之间的界限。追根溯源,是因为张元济、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坚持的那条路径,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先贤践行的重视实际、重视当下、重视效果的实践理性,就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现代化思考,也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与风貌的现代性。

书籍作为出版机构的产品,兼有一般商品与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。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效益,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责任。近代出版机构办得成功与否,从根本上说,就是对于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亦即义利关系处理得当与否。约略说来,结果无非以下三种类型,或曰三种境界:一曰得利失义,以盗版拼凑、低级趣味为利藪、旋起旋灭的书商多属此类;二曰得义失利,有外部资金注入、党派或官府所办、只谋其义、不计其利的出版机构属于此类者为数不少;三曰义利兼得。当然,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,每一类型之中,义利比重又可分为多种层次。那些历史悠久、饮誉遐迩的出版机构,多属第三种境界。近代七大书局,即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、大东书局、开明书店、正中书局与文通书局,无一不属此类。长踞榜首的商务则是其中的楷模。其经营理念的两句话,“在商言商”与“文化本位”,典型地反映了义利兼顾的宗旨。

义利兼顾有两种模式。第一种是义利分途,以利辅义,即出版人常说的以书养书:两类书都出,一类以经济效益为主,赚钱,但文化上没有多少贡献;一类以社会效益为主,得名,但不获利或获利甚微。出版统筹兼顾,经济上通过前者弥补后者,起助推作用,声誉上通过后者滋养前者,起带动作用。第二种是义利合一,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为一体,一部书既赚钱又得名。不消说,第二种模式最为理想,也最为高超。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之处,就在于很多时候能够做到义利合一。

商务初创时的业务,主要是为商家印刷票据广告,翻印《华英初阶》及《华英进阶》之类英语教材,以及适应科举考试的字典、书籍,诸如《康熙字典》《通鉴辑览》与《纲鉴易知录》等,志在谋利,这也是其他出版机构能够做或正在做的事情,文化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贡献。商务进入义利合一境

界,始于张元济加盟。编写新式教科书,为教育改革打基础;出版严复等人所译西书,为文化启蒙添新知,这些都是时代所呼唤、社会所急需的文化产品。1906 年清廷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 102 种,由民营书局发行的有 85 种,其中商务版就占 54 种。清末民初鼎革之际,在教科书编印方面,商务一度有些迟钝,让中华着一先鞭,但很快缓过神来,奋起直追,终于重坐头把交椅。到 1924 年,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上,商务占十之六七,中华占十之二三。民国时期,商务编辑出版的以《辞源》为代表的大型汉语词典,以《四部丛刊》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为代表的大型古籍丛书,以《万有文库》为代表大批知识读物,以《东方杂志》《小说月报》为代表的众多刊物,在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、西方文化引进与普及、国民素质的培育与提升方面,都有重要价值,都是在现代化、全球化进程中,中华民族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产品。这些项目的实施,为商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,也为商务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。1947 年,胡适推荐张元济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,就特别提到他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就:“他对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刊行史籍与史料,他主持的《四部丛刊》与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等,使一般史学者可以容易得着最古本的史籍与古书,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。”(《胡适书信集》,第 1101 页。转引自张人凤、柳和城编:《张元济年谱长编》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,下册,第 1268 页)

义利合一,名利双收,出版机构谁不想臻此境界?但真正能够做到的总是凤毛麟角。考其原因,在于要达此境,必要条件至少有三:一是出版人必须具备宏阔的学术视野,敏锐的时代意识;二是企业实行科学管理,从组稿编稿、印刷发行到成本核算,每一环节都优质高效;三是具有世界一



张元济



王云五

流、超越同行的印刷设备。这三条,人才、制度、设备,互为支撑,缺一不可,商务都具备了。这三条,也是学界论述商务印书馆成功之道时常述及的。这里需要略加申述的是第一条中“敏锐的时代意识”问题。

众所周知,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济效益,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责任。从晚清到民国,中国经济结构、社会结构、教育体系、政治制度、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、持久、深刻的变化,从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,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,从以农立国、社会流动量少而缓慢,到振兴工商、社会流动逐步加大加速,从科举考试到新式学堂、出国留学、职业教育,从诗云子曰到声光电,新知识、新事物、新职业,层出不穷。一句话,社会发生了全面的转型。是否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转型,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出版内容、样式、重点具有明显的不同,是衡量出版人是否高明还是平庸的最为重要的指标。纵观商务成功之路,从张元济到王云五,高于庸常的地方,就是强烈的转型意识。

张元济是对时代特点极其敏感的人,最突出的表现有以下三点:

一是自学英文。他先前走的是读书做官老路,相当顺利,23 岁中举,26 岁中进士,28 岁任刑部主事。但是,他不

是到此为止,在仕途顺畅时,已经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气质,即不安现状,自觉进行知识更新,从 1896 年开始学习英文,广读新的书刊,且拜了专门的英文老师。其时,虽然风气渐开,但在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中,主动学习外语、研究西学者还是难得一见。张元济入值总理衙门后发现,那么多章京中,仅他一人能识英文。

二是弃政从文。戊戌政变以后,张元济毅然弃政从文,将自己的聪明才智,集中投放到教育与出版方面,一直坚守在文化阵地上。民国时期,政局动荡频仍,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,规避政争,从短时期看似似乎不辨是非,明哲保身,但从长时段看,恰恰是对政争本身的透彻理解。

继张元济主持商务工作的王云五,更是一个对时代特点有深切感悟的人。他聪明过人,好学成性,知识渊博,自称“旧学没有考过科举,新学没有进过学校”,但其旧学、新学都达到了很高水准,连胡适都刮目相看,赞不绝口。他勇于创新,长于管理,主持馆务以后,借鉴国外出版社先进管理经验,建章立制,启用新人,使馆务大有起色。他策划的《万有文库》,一千七百多种,包括国学基本丛书、汉译世界名著、百科小丛书、新时代史地丛书,以及工学、农学、商学、

算学、医学、体育、自然科学小丛书等,包罗万象,影响极大。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,运思之巧妙,使用之便捷,堪称汉字检索史上的千古奇迹。他有句名言,“编著书籍当激动潮流,不宜追逐潮流也。”所谓“激动潮流”,就是对时代变化、社会转型有敏锐的觉醒,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,引领潮流的走向。

纵观清末民国商务几次大的商机,从新编教科书,出版严译、林译西书,整理中华古籍,到《万有文库》的编辑出版,都与张元济、王云五等人对社会转型的准确把握有直接关系。

商务印书馆是近些年学术界比较热门的话题,国际、国内都有多部著作问世。有的侧重教科书编辑与出版,有的侧重古籍整理与研究,有的侧重企业管理与创新,有点侧重文化市场,有的侧重城市环境。

所谓现代性,按照金耀基先生的解释,是指现代文明体的性格和风貌。现代化是世界各国、各地区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普遍现象,落实到不同国家与地区,则因其地理、历史、文化特点不同而呈现鲜明的地